

【文化研究】

郑观应慈善思想论述

兰天祥 杜国良

(宝鸡文理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6; 宁夏隆德县第二中学, 宁夏 隆德 756300)

摘 要: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内容丰富,在慈善方面,也是如此。郑观应的慈善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善恶论;二,儒化论;三,时务论;四,社会论。

关键词: 郑观应; 慈善思想; 善恶论; 儒化论

中图分类号: K8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086(2011)01-0125-04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研究者对他的研究多注重于其经济、外交、人才等思想的研究,而对其慈善思想的研究则较少关注。作为对郑观应思想研究的一部分,应该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

所谓慈善,即指一种美德、善行和爱心,是人类最需要,也是最应具备的基础性道德,其本质是人类善爱之心的表现和标志。无论是西方词汇中的“philanthropy”、“charity”、“beneficence”、“benevolence”,还是宗教中的“行善”、“十一捐”、“慈善即爱”等的宣传和教导,还是中国“慈谓爱之深也”或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都是慈善一语的核心所在和表现。慈善,在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郑观应认为,“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济,……救济之功可以赞化育,救济之事可以参天地”^{[1]43}。从《救时揭要》所收录的二十四篇文章中论述救灾恤贫和慈善事业等社会问题的有七篇,宣扬因果报应迷信劝人行善的有五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慈善思想在郑观应思想中所占的地位^{[2]18}。他的慈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善恶论

在中国社会,不可能人人都信佛,但有可能人人

都受到相应的善恶论的影响,古代、近代都如此。所不同的是哪个时代多些,哪个时代少些,它们只有数量上的区别,而无本质上的差异。佛教的善恶说、孽缘论、宿命论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同的目的和作用:人生在世,应当尽量行善,才能有好报。这种好报有可能表现在今世,也有可能彰显于后世。对这一点,郑观应是有着深刻认识和了解的。“自古以来,普天之下未有善而不福,恶而不祸者,惟报应之迟速不等耳”^{[1]50}。在郑观应看来,善恶报应是在存在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郑观应在他的作品《救时揭要》中曾多次提到过善恶报应的事,如他记到“陈惊,后益力为善。施衣舍药,收葬尸骸,家计荡然。是年,二子登科。一子世其业,名亦大噪。乡人快之,咸以为报”^{[1]27},还有“如苏文忠公之祖端正道人,乐善好施,得异人之点穴。吴都宪之成人夫妇,救百户,得天赐之牛眠”^{[1]41},再记有“同乡张某,颖悟好学,勤俭好施。……张罄家以糜粥济之,活者万计。次年赴试,……果登甲榜,官至尚书’可知救济之功,报应之速,益信范文正公之言亦。近世大家,如吴门之潘氏、昆山之徐氏、常熟之蒋、常州之赵、钱塘之许、溧阳之任、南昌之熊、桐城之张,皆其先世积德累功所致”^{[1]43-44}。这些都是行善获福之事迹,同样也有人在世行恶而遭报应的记载,他在《救时揭

收稿日期:2010-11-17

作者简介:兰天祥(1975-),男,宁夏吴忠人,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

要·劝戒溺女》中说有一个绅士,因为在世时溺女太多,结果病重七孔流血而死,临死前劝人不可溺女。“善则千万人蒙福,恶则千万人罹祸”^{[1]45},正因为这样,所以郑观应才说“我命当败,积德以造之,积善以造之,命必完固有成亦”^{[1]50}。郑观应认为“孝悌之道,通乎神明,此积德于亲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积德于世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此积德于身也;毋不敬,严若思,此积德于心也”^{[1]48},对人们来说,行善不光在于对亲人,对今世,对自身,更重要的是在于心灵。“有财者当济之以财,无财者当济之以力。……是在人之为善诚与不诚耳”^{[1]43},人们从事和参与慈善事业活动完全在于人们心诚与否。这就是说,慈善事业的参与其关键在于人心,善良的是人的心。

二、儒化论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郑观应还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抱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对他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生活在旧知识分子家庭里,他也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的影响。他的父亲郑文瑞“家居筹置义田,兴立善堂。地方公举:若水利,若桥梁,若义仓,或创或因,无不尽力乐输,殚心规画”^{[2]2}。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不时的看到他忧国忧民的感情流露,无论是他主张商战,还是建议广设工艺局等都是如此。作为一名官员,他更加深切的认识到官员执政的重要性,一个好的官员和一个好的政策,可以使上千万人享受幸福,但如果反过来则会使上千万人遭受痛苦。“从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无食则易生盗心,盗心生则胆愈大,胆愈大则放僻邪侈无不为之。故先圣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毋使流连荒亡一夫失所;……若费百万之资,并令各省富绅捐助不足,每省设一栖流局。拣举能员立为总办,广置田产,大屋千间,收无赖丐人,或使之耕,或教以织”^{[1]23}。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知道,郑观应的论述与现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在其著作中所论述的古代循吏深受儒家思想为官为政的表现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郑观应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在他的慈善思想中仍然围绕着农业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民之供亿,出于土地。此古今不易之理”鉴于此,他认为闽、广等地方政府官员应该核查土地,查明荒地,然后设局招耕,这样就能“野无旷土,市无游民,实于国计民生有裨不少”^{[1]84}。

三、务实论

生活在近代社会的郑观应,其思想上肯定也会

烙下很多近代的印迹。作为早期的买办、“商战”的首倡者,郑观应对现实社会有着比其他人更为深刻和准确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也才表现得更为务实,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的经济、商战思想上,也表现在他的慈善思想上。处于社会文化交流变化中的郑观应,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深受西方商业思想的影响,更为注重实际,着眼于现实,所以他认为在慈善事业上应该更关注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人们应该极力尽其所能去从事慈善事业。郑观应认为人们与其把大量的钱财花费在神会犁园、祈福求神上,还不如“集资效范文正公创义仓、开义学、设置婴堂、收埋路尸,舍药施医,利民利物,作方便阴功;……使省犁园神会之资,改作济世救民之事”^{[1]35},如果人们真能“移此巨资,广行善举,或开义塾;……或立善堂;……或抚恤孤”^{[1]147},那么肯定能“造无疆之德业”^{[1]147},这也算是一件善事。

郑观应生活的时代,中国发生了历史上较大的一次旱灾即“丁戊奇荒”(是指光绪二年至光绪五年,即1876-1879年,华北数省因连年不雨而发生了持续四年的特大旱灾,其覆盖面几乎囊括了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东北等地,殃及灾民1.62亿,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为了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1877年郑观应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在上海办筹赈公所,1878年,又与徐润、盛宣怀等办义赈公所。这一机构为山西筹集了成千上万元的救济物资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的报纸对此事称赞到,“在事之人无不悉心竭力,所集之款涓滴归公。遂觉自有赈务以来,法良意美,当以此为第一善举”^[3]。

作为封建政府的一员,他非常注重维持社会的稳定,因为“担心‘游手好闲饥寒者众’,致行凶抢劫,酿成巨患,乃从‘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观点出发,主张办义院以收容无赖丐人,使自食其力”^{[2]20},他认为这样能使“贫有所归,病有所托。不致乞食市尘,频受鞭笞之苦”^{[2]20},同时这样还能使人民“化莠为良”,“同沾雨化”^{[2]20}。对于那些“少年强壮之夫”,他认为可以“官为资给,督令垦荒”,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国家可增赋税”,而他们也能自食其力,“所谓一举而数善备者”^{[1]525}。

四、社会论

社会发展是历史永远的主题,每个历史人物在社会发展中都会起到作用,或阻或促。眼界开阔的郑观应,更为关注近代社会的发展。受到西方商业思想的影响,郑观应认为作为政府要施行仁政,尽其

所能去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他建议要各省普遍设立栖流所,收留流浪人员,建议要开办工艺局,教人以谋生的手段,同时他还认为政府官员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造福,而不是“权势在手,喜怒由心”^{[1]45}。但那时候的清朝政府是有心无力,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上做的并不是很好,甚至是无作为,但人们不能因为政府的部分无作为,就放弃对社会的改造,放弃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正因为如此,郑观应更加关注慈善事业,提出了自己一系列思想和看法。

在他看来,社会要想继续发展,就应该注重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继续发展,取得进步。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完全依靠政府办学是解决不了全部问题的,那么该怎么办呢?“富者出资,贫者就学”^{[4]526},郑观应认为应该鼓励富裕者出资办学,让上不起学人的来学习,为国家培养人才,因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国势所由强”^{[1]276}。有了学校教育,就能够培养更多的人才,国家也才能够富裕和强大。“人才济济,国势以强也。是故人才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异,而农政、商务亦日增新法,日为推广”,在郑观应看来,国家有了众多的人才,才能更进一步接受新的观念、技术,社会才能向前发展,也只有国家进步了,社会发展了,才能使得“市无游民,廛皆食力”,如果这样“则士得教而民有养。甚至疲癃残疾、贫老孤婴皆有院以周恤之。无一夫不得其所”^{[1]480}。也正是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所以郑观应在他的作品中反复提到要广设工艺局,要授人以渔,“教其各成一艺,俾糊口有资,自不至流为盗贼”,在中国社会人口日益增长,生计日渐艰难的情况下,“工艺学堂亦今世之及务也”^{[1]267-268}。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发展职业教育对于慈善事业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职业教育不光是教人以知识,更重要的是它能使学习的人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去谋生,用郑观应的话说就是,“不但教育成才,……亦可令其技艺通习,资生有路也”^{[1]476}。这样既能够减少社会的失业人口,又能够稳定社会秩序,对他的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有所裨益的。如果不这样,社会上就有可能涌现出更多的无业游民,他们就有可能沦为盗贼,危害社会。

社会不断发展,新鲜事务不断涌现,在近代中国社会尤其如此。对社会中不断涌现出的新鲜事务,郑观应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尤其是他从社会发展,从是否对慈善事业有益方面对这些加以肯定。除了对西方的慈善事业及其设施表示羡慕之外,郑观应

对采用西方机器进行耕种也表示认可,认为“若用西国机器,以之耕种,可使土膏深透,地力腾达,物类易于发生,收成亦当倍蓰”^{[1]89}。不仅如此,在郑观应看来,政府在治理水患时也可以采用西方的办法,“西人挖河,以机船在河中挖起淤泥,即以其泥填高堤坝。法甚便捷,且所浚较深”;在应对火灾等灾害时也可以像外国那样,“加钊水井”^{[1]29-31}。当时国内很多人对火车的出现表示疑虑,认为它的出现将会导致诸如操舟、架车、递文传信等行业人员失业,而给社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而郑观应认为,“铁路虽成,舟仍不减;且铁路旁有马路,推车者亦可营生;至于传信递文,不过时日较速,仍须留用此辈,何损于民”^{[1]81},这就是说火车的出现在郑观应看来并没有造成它业人员的失业,相反还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同时火车的出现还有益于慈善事业,“使载物之器良便,而运物之价又廉,一切种植立可以此之有余,济彼之不足,……。即或旱干水溢,偶有偏灾,亦能接济运粮,籍苏民困”^{[1]81}。同样,对于社会上出现的报纸,在郑观应看来也是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他认为“报馆之设其益甚多。约而举之,厥有数事: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漠视,无动于衷。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款,源源挹注,得保子遗,此有功于救荒也”^{[1]347}。通过报纸的宣传报道和介绍,将全国各地发生的灾情告知民众,这样做是有益于动员社会众多民众参加到慈善活动中来的。

中国传统社会“重男轻女”,“弃婴”,尤其是弃女婴,溺女婴现象严重。针对此种情况,社会各界纷纷援助,捐建育婴堂,收容被弃婴孩。根据梁其姿的研究,在1840-1911年建有435个育婴堂^{[5]351-367},再据小浜正子对上海1926-1928年几个育婴堂的事业研究中,可知其共收容婴孩5915人,其中女婴5467人^{[6]58-67}。由此可知随着社会的发展女婴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郑观应生活的那个时代,溺女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妇女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从她们降临的那天起就成为人们忽略的对象,更有甚者,在她们刚出生时就有可能被溺而死,对这样的事情,郑观应是加以反对的,他认为“溺女一事,罪孽甚大”。他举例从善恶报应的角度去劝说人们切勿溺女,“凡溺女者以故杀子孙论。纵不畏冥诛,岂不畏显戮耶?夫天地好生,万物并育。一虫一蚁尚欲贪生,一草一木尚求滋长”^{[1]36-37}。自然界天生好德,生化万物,尚且如此,人就更应该这样。同时,他还主张

兴办女学,他认为,“如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始。推女学之源,国家之兴衰存亡系焉”^[2]¹⁶³。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处于社会变革中的郑观应,其慈善思想虽然还有着传统观念的一面,但其更多的是接受了近代思想变迁的一面,正是这一面对他的思想添彩不少,也正是这一面对传统开始有了冲击,对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了开创,对慈善事业在整个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2]夏东元. 郑观应传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 [3]申报[N]. 1883-08-01.
- [4]陈学恂,等. 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上)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 [5]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6][日]小浜正子著. 葛涛,译. 近代上海公共性与国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上接第121页)

可以看出萧红早期作品以不同的人生剖面,透视了“九·一八”事变后日伪统治下我国东北三省的社会黑暗,歌颂了在全民族共赴国难、救亡图存的广阔历史背景上广大劳动群众的自我觉醒并积极走向反叛抗争的艰难历程。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开发中华民族不愿做亡国奴的生命意识,激发劳苦大众的生存力量,以及他们对于理想人生的向往和追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特征和浓重的民族文化反思意识。

萧红对生命、生存的独特认识,使她在表现国民性主题历史意蕴时,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作家有着根本的不同。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作家,大都采用一种“俯视”的视角来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与命运,对他们的不幸处境与思想状况流露出悲悯哀怨、阴郁沉重的感伤情绪。作家们描写种种病态人生,目的是为了揭示出病痛以引起疗救,他们通过反思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方式,来达到重铸民族灵魂、改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目的,具有一定的社会功利色彩。而一生都在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与命运的萧红,却没有高高站立于她的人物之上,她着眼于善良而又卑微的小人物,关注他们非人的生活、不幸的命运,诅咒践踏人的黑暗势力。她和笔下的人物一起去体验生活的种种苦难,感受生命

无价值的人生悲剧,从而展示他们畸形的生存状态。

萧红在她的创作实践中,以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萧红的小说指出贫困文化造成了广大农村一幕幕的人间悲剧,蛮荒的生存环境、小农经济的原始闭塞使得人们思想愚昧、目光短浅。描绘女人们如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在继承五四传统的道路上,萧红以自己创作呼唤着妇女解放与女性自觉。她自觉地、清醒地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来观照、反思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人们的生存状态,展示了他们愚昧麻木的精神病态,并由此来观照他们生存的深层困窘。

参考文献:

- [1]张浩. 苦难的女性悲歌——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1).
- [2]萧红. 生死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3]乐黛云. 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J].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1991.
- [4]摩罗. 《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J].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1997.